

近四十年中国虎文化研究回顾与反思

任宽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中国虎文化研究近四十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学术交流与理论方法借鉴的重要影响。中国虎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虎文化起源与流变、虎图腾崇拜与虎神话、宗教中的虎文化、虎俗、虎故事及虎文化的其他研究等,这些成果在虎文化史和虎信仰及其民俗艺术等领域,文献宏富,讨论亦深。由此思考当下中国虎文化研究的体系化与创新路径,为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与观点,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中国虎文化;研究体系;回顾;反思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0)06-0014-07

中国虎文化的起源较早,源于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与我国原始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叶舒宪指出,所谓虎文化,是指特定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对虎的认识、信仰、观念、习俗等的总称。^[1]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政府保护和社会关注,大量虎文化事象得到了发掘,如彝族老虎笙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学界的虎文化研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拟回顾近四十年来的虎文化研究成果,反思虎文化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探索未来虎文化研究新的增长点,以期拓展多元方法论视角下的研究路径。

一、回顾:多侧面多视角的虎文化研究

纵观近四十年的中国虎文化研究,我们发现,学术成果较为丰富,多侧面多视角的研究主要包括六个方面:虎文化起源与流变、虎图腾崇拜与虎神话、宗教中的虎文化、虎俗、虎故事及虎文化的其他研究等。就学术命题与方法论而言,这些内容大体可分为四种。

一是虎文化史研究。

以中国虎文化的起源与流变而言,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发掘的蚌塑龙虎图,说明在原始社会末期不只有龙的崇拜,也有虎的信仰。

汪玢玲认为,虎作为凶猛的野兽,与原始狩猎民族生产生活关系更为密切,中国原始部落氏族以虎作为图腾,将虎视作本部落的祖先或保护神,要比虚构的龙图腾崇拜物产生得更早。^{[2](P18)}虎图腾崇拜与虎神话研究,作为文化史的重要命题,代表材料是濮阳西水坡龙虎蚌塑,它们围绕着一具成年男性骸骨,学术界大多认为墓主人是当时部落的巫师,龙、虎是他沟通天地的媒介。虎要么作为氏族部落的祖先或保护神被崇拜,要么被神化,成为人类早期巫术活动的助手。^{[3](P4)}

长沙南沱的大塘农耕遗址中发现的7000年前的土陶器上绘有太阳纹、鸾鸟纹、长獠牙人面纹。对于长獠牙人面纹,曹振峰认为不是炎帝图像符号,并非鸟喙,这种獠牙只有虎豹才有,长獠牙人面纹应是人面虎头纹,也许是南方崇虎部族的徽记。^{[4](P11~13)}

考古研究表明:从夏商周时期开始,虎文化所经历的轨迹大致从“神化”逐渐转向“为统治者所用”,如湖南安化出土的商代虎噬人青铜卣、皇室器物的虎纹装饰等;春秋战国时期,虎文化的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通灵功能逐渐淡化,作为王权地位的象征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上的虎形套环造型,西安郊区出土的用于调兵遣将、象征军事权力的杜虎符;秦汉之后,虎的王权象征地位逐渐

收稿日期:2020-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18ZDA268)

作者简介:任宽(1985-),女,贵州铜仁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被龙代替,虎的象征意义集中表现在军事上。由此,虎文化在民间得到广泛迅速的传播发展,各民族的物质、精神领域都有较显著的表现形态。

刘尧汉继续了闻一多关于伏羲、女娲同出于葫芦的研究,指出伏羲本为原始虎图腾,秦汉以后的史家有以龙为真命天子的思想,尊伏羲为三皇之首,便将伏羲的虎形改变为龙,成了人头龙身。^{[5](P258)}汪玢玲将伏羲由个人图腾衍变成氏族图腾乃至民族图腾的过程进行了详细阐述,得出结论:伏羲氏从他母亲那里“感蛇而生”,得到了龙图腾的血统传承。同时,他个人从事伏虎、驯虎、献牲的庖牺氏的祭祀圣职,由畏虎而敬虎,奉虎为图腾,并接受了虎图腾崇拜的氏族(如羌戎族)信仰,因与实际狩猎生活密不可分,崇虎见重于时(因为龙毕竟是虚幻的动物)。而伏羲又是领袖人物,他的个人图腾,在他发迹之后,便成了氏族图腾旗帜,或者和其他羌戎虎氏族融合(如西王母氏族),形成庞大的部落势力。^{[2](P67~71)}王朝晖考察了虎伏羲部落遗裔,远古羌戎以虎族自居,虎伏羲则为古羌戎部落代称或其首领名称。这个部落继续由一个虎族分为黑白两支:今天藏缅语族的羌、彝、纳西、哈尼、拉祜、傈僳等族(黑虎),白、土家、普米、阿昌、怒等族(白虎)。^[6]

虎图腾的研究还涉及到其他方面。林琳指出,虎图腾崇拜的伦理观念和传统习俗,对信仰虎神的人们共同体具有聚合功能、心理调节功能和行为规范功能,即能对群体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使社会集团持久保持一种巨大的向心力,使得崇拜虎图腾的人群形成一股强烈而鲜明的自我制约意识和加强内部团结的社会心理定势。^[7]王秀薇、孟凡清认为,基于族群和地域的原因,北方草原艺术中的虎图腾形象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指向黑龙江流域。^[8]朱德普的研究发现,虎图腾曾是傣族历史上多个部落或氏族皆有过的图腾,但它始终不曾发展成为傣族的民族图腾。^[9]杨甫旺则分析,巴蜀虎图腾是在巴蜀两族各自独立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并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图腾文化。^[10]就虎文化与宗教的关系而言,在我国的原始宗教观念中,虎是守护神,它与道教、佛教、萨满教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刘尧汉从七个方面论证了道家 and 道教同出彝族所保留的远古羌戎的原始虎宇宙观:黄帝和西王母所居昆仑与彝族崇拜葫芦及尚黑;《庄子》和《穆天子传》西王母“西膜”与彝族女祭司“西摩”;道家壶子和道教《壶史》与彝族崇拜葫芦;道家 and 道教尚玄贵左与彝族尚黑贵左;老聃、李耳的彝义为虎首、母虎;

道家 and 道教崇“太一”源出彝族虎宇宙观;道家、道教和彝族关于“天、地、水”的观点。^[11]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易谋远从“文明起源”和“文化起源”这两个概念出发进行辨析,认为道家 and 道教的“太一”不是源于彝族虎宇宙观,将彝族虎宇宙观认作中国文明的源头是很值得商榷的。^[12]此外,曹振峰在其《神虎镇邪》中不仅记录了《道藏》中道教斋醮时的一段描写,指出文中所写的“注想”就是宗教的精神想象,虎成为道者登天的工具,还介绍了明代陈继儒的《虎荟》一书,其中不乏道教有关虎的传说故事。^{[4](P42)}汪玢玲指出,中国佛教来自印度,也带有印度佛教崇虎的特点,同时又与中国禅宗思想结合,发展为禅虎。她列举了部分佛教传说故事,说明佛缘和虎的密切关系。^{[2](P149~153)}她还通过萨满的跳虎神、治病的牛尔罕挂图及萨满的鼓槌、神衣等推断,信仰萨满教的北方通古斯系各少数民族普遍信奉虎图腾。^{[2](P153~164)}

二是虎叙事研究。

虎叙事作为中国虎文化的一项主体内容,是人们在虎信仰基础上有关虎的神力与变化、报恩与际遇以及自然与人文关系的语言形态,既有浓郁的神话特色,也有温馨的世俗意味,大多具有较高的叙事艺术,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对象。

中国虎神话与虎图腾崇拜密切相关,其神话传说主要记载于《山海经》。曹振峰《神虎镇邪》对《山海经》中涉及虎的内容进行了评介。汪玢玲在《中国虎文化》中讨论远古虎神话及四象守护神时,也主要以《山海经》中的内容为佐证材料。她分析彝、纳西、土家族神话时,则结合彝族、纳西族黑虎图腾信仰和土家族白虎图腾信仰进行论述。张勤《西王母神话传说研究》涉及到了西王母神话传说中虎意象的研究。陈永香、曹晓宏认为,昆仑神话中的虎文化符号和西南彝语支民族中的虎崇拜,在文化意义上是相通的,都是源于古代氏羌族群的虎崇拜。作为男性的野蛮人酋长和巫师的西王母之虎齿、山神和帝都守护神陆吾的状虎和虎爪,与西南少数民族彝语支民族的创世神虎、山神虎、象征男性祖先的虎及各种习俗中的虎文化,其文化意蕴是男性话语背景下对强大力量的崇拜。^[13]赵宗福以语言为主要研究手段,提出中国月亮神话的要核是虎(於菟),月亮神话实际是月虎神话,而月虎神话作为昆仑神话的有机组成部分,起源于西部古羌。^[14]

虎神话研究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虎神话的民族性与代表性,以《山海经》为基本材料,研究其虎意象与虎力量的神话元素,也提出了颇有创新意味的月虎

神话与昆仑神话的内在关联,富有启发性价值。

以虎故事研究而论,研究文献比较丰富,大致可分为虎故事类型研究、虎故事的源流追溯、虎故事的编纂收集、虎故事的其他研究等。

汪玢玲将老虎传奇故事分为十类:神虎型故事、义虎型故事、人化虎型故事、人虎婚型故事、虎媒型故事、虎皮井型故事、虎外婆型故事、虎医型故事、虎寓言型故事、虎笑话及虎戏故事。^[2]孙正国对流行于37个民族中间的270余篇虎故事的古今异文进行系统考察,以AT分类法和丁氏索引为基础,将中国虎故事分作四类,即恶虎型、化身型、义虎型和其他类型,同时还阐述了它们的构成演变及文化内涵。他指出,虎故事的一部分由虎神话演变而来,中国虎故事展示了多民族文化的差异和融合,化身型虎故事与志怪传奇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相互借鉴吸收的一般规律,中国虎故事展示出老虎形象的审美价值和伦理意义。^[15]此后他发表了系列论文:《中国化身型虎故事的母题阐释——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之二》《无法超越的悲剧:〈师道宣〉的叙事解读——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系列之三》《主体的确认:〈峡口道士〉的叙事解读——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之四》。曲彦斌《虎文化与人生》第五章《颂仁、敬孝、尚义、尊佛》,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第八章《明清民间故事(下)》的《义虎型的〈义虎记〉》,较为详实地考察了汉族人虎缘故事的形态,并对其亚型作了很有见地的论析。^[16]此外,刘守华还指出,中国汉唐以来出现的几类虎故事,在明清时期都得到了传承,并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演进,焕发出新的光彩。它作为中国虎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将价值永存。^[17](P454~455)

有学者对人虎缘故事进行文化解读时指出,晋代出现的虎报恩亚型故事与晋代佛教大盛施加的影响有关。这类故事的产生和传承充分展示出中国文化在魏晋时期与印度佛教融合的特殊形态。^[16]在虎故事的源流追溯上,曹小丰对先秦至隋唐时期小说中化身型虎故事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这类型故事的演变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8]孙国江认为,虎依故事起源于六朝时期,与人化虎故事有密切的关系,并且二者都来源于上古西南地区的虎神信仰。^[19]王立、铁晓娜对《向杲》人化虎再化为人的故事来源进行分析,认为情节结构与《太平广记》中的部分故事非常相似,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化虎需要身披虎皮衣的描写套路,应当来自于中外早期民间故事中颇为流传的“羽衣型”

故事,其中必不可少的变化道具,更有可能来自于汉译外域的佛经故事。^[20]

高明对《虎苑》和《虎荟》进行了简要介绍,并从虎故事的编纂分析了晚明江南的尚奇之风。^[21]黄大宏、张天莉对《虎荟》的成书情况、材料来源及考定依据、书中虎故事类型及文献价值进行了详细说明。^[22]

虎故事的其他研究很多。孙正国指出,人虎缘故事的文化意义包括:虎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性,折射了中国文化伦理中心的特质,显示出早期中国文化吸纳世界文化进而改造、重构本土文化的开放性。^[16](P29~33)肖远平从民俗文化角度分析了苗族“人虎婚”故事。^[23]他还对彝族、苗族虎故事审美心理进行了考察。^[24]刘正平认为,唐五代文言小说中虎故事的形成和传播,与故事发生地的动物崇拜有密切关系,故事的要件也遵循巫术思维的基本原则。^[25]韩瑜《唐代小说与唐代民间信仰》对唐小说中的虎崇拜与唐代民间信仰进行个案分析,探讨了这一时期虎故事发生变化的原因。何胜莉《中国古代化身型虎故事研究》,对古代文献中化身型虎故事的主题、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民俗心理以及审美特征等进行了分析。胡湖《中国的虎故事与虎文化》,对中国古代文言叙事作品中的虎故事与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类研究。

三是虎俗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范围较广,涉及到岁时节日的习俗,人生仪礼习俗,汉、彝、纳西、土家、白等民族的不同虎俗研究等。

汪玢玲在其《中国虎文化》一书中,将各族崇虎山神、崇虎的象征性、虎能镇邪祛病、灵虎长寿善卜、祠虎祈子以及汉、彝民族节日礼虎的内容均纳入其中,整体来看,研究的时空跨度大,作者择重点进行了阐述。这在她的《中国虎文化研究》及《东北虎文化》中均有涉及。曹振峰在《神虎镇邪》中则将古今岁时节日中的虎俗和人生仪礼中的虎俗分章简述,并将各民族流传至今的崇虎习俗与他们的图腾崇拜、祖先神话等进行了综述,内容简明通俗。相关的研究论文将各地崇虎习俗与傩文化、图腾崇拜等联系较多,如张苑《湘鄂西土家族白虎文化的多样性与功能研究》,赵士林、田婧《云南双柏彝族虎傩文化及其面具》,杨向东、冯楚吟《原始图腾崇拜视角下的舞蹈遗存例证——以彝族“虎舞”为例》,唐楚臣《彝族虎仪与傩事》,刘凯《跳“於菟”——古羌人崇虎图腾意识的活化石》,高敬菊《武陵土家虎文化钩沉》,柏

贵喜《从土家族还雉愿看雉与虎的关系》,徐燕《论巴族的崇虎习俗与现代的白虎崇拜现象》等。

四是虎文化的其他研究,包含虎典虎谚文字研究、虎工艺研究、中外虎文化比较研究等内容。

汪玢玲在《中国虎文化》一书中将“虎典虎谚”细分为五类:以虎豹为喻、赞美虎形虎威类、人虎关系的哲理性、老虎习性的谚语和歇后语、虎联。叶舒宪曾对“虞”字背后的神虎信仰进行过详细阐述,并指出古文字学家叶玉森的推测值得参考:古之虞人乃掌田猎之官。猎时或被虎首以慑群兽。故其字从虎从大,大乃人形。^[1]

虎工艺包含种类众多,研究者的专业类别也相对增多,本文所提及的材料还需做进一步补充。杨阳、林芳、周佳《中国“虎”》,将虎文化分三个专题进行研究:神职虎、政军虎、民俗虎。其中“民俗虎”部分介绍了虎枕、布老虎、儿童虎服饰、虎雕塑、神虎画、虎子及其他饰虎生活用具。汪玢玲则在《中国虎文化》一书中主要介绍了虎画、虎年画、虎剪纸、布老虎和虎雕。针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布老虎,马知遥对其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精神和民间习俗的重要性,呼吁重视遗产的生存空间和精神载体。^[26]

汪玢玲对中国虎崇拜与美洲虎文化的渊源开展研究,认为美洲土著先民来自亚洲中国,中国虎文化传入美洲并产生深远影响;此外还介绍了朝鲜半岛的虎传说故事。^[2]苑利对韩民族和中国西南彝语支民族虎图腾文化进行了比较,发现二者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产生很可能是因为这两支文化上古同源。^[27]韩国学者安东潜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和韩国的虎图腾崇拜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韩民族的崇虎习俗与中原汉文化语境中的虎崇拜习俗是同轨的,在相互吸收与相互排斥的交融过程中,两者拥有了诸多相同的信仰要素。他认为,西南少数民族的虎文化在渊源上与韩国的虎文化有着类似性,进而在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发现韩国的虎文化接受了中原的儒教文化,呈现出充满人情味与诙谐性的民族特色。^[28]

近四十年我国虎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对虎文化起源的研究普遍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也从古典文献中寻找证据,这对虎崇拜、虎信仰的追溯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二是从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融合的角度,考察中原汉民族及少数民族虎图腾和虎神话的发生和变化。三是对虎故事不再停留在材料的简单收集上,而是开始运用叙事学、解

释学等理论对虎故事展开研究,这具有重要意义。四是现有的虎文化研究专著数量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汪玢玲《中国虎文化研究》,曲彦斌《虎文化与人生》,曹振峰《虎文化》,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等,前三者内容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偏重民俗性,后者的论证过程在学界存在质疑之声。

二、虎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

中国虎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虎文化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方法论得到拓展和运用,成为近四十年来虎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

上世纪80年代对虎文化的研究多散见于期刊,论著仅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较为突出,研究对象主要为虎图腾、虎神话等;90年代后期至今,虎文化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文化起源、图腾神话、民间虎俗、虎故事等相关领域。其中,以汪玢玲的虎文化研究三部曲《中国虎文化研究》《中国虎文化》《东北虎文化》最为突出,研究趋于系统化。正如白庚胜在《龙虎和合华夏魂》(《东北虎文化》序)中所说的:“汪玢玲教授开创了‘中国虎文化学’。”《中国虎文化研究》跳出了传统文化学研究的范围,开拓了虎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作者广纳古今文献资料,以汉族和涉及虎信仰的彝、土家、白、纳西等少数民族的资料为主,还收入部分国外资料,从多个研究视角切入,构建起此书的整体架构。三部曲的另两本专著与之既一脉相承又有创新和发展,在更高的层次上创立了中国虎文化学。汪玢玲谈到此书的写作缘起时说,自己曾绕了几年大弯子去编《古文献辞典》《地方志》等工具书,但正是这些“离了谱”的工作,使她大开眼界,从而有机会了解和浏览大量的古籍文献和地方文献,从数千种书目提要、各种虎传奇专书、类书、文人笔记和地方志中收集选用虎俗资料,同时又广泛收集俄、美、韩、日、印等国的相关资料,这样的方式跟“就事论事,单项猎奇”相比,更富有底蕴,涉猎范围更广,更能开阔视野。《虎崇拜的深远渊源》综合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对虎崇拜的渊源进行了论证,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发掘的蚌塑龙虎图,说明在原始社会末期不只有了龙神,还有了虎神,并认为虎作为凶猛的野兽,与原始狩猎民族生产生活关系更为密切,要比虚构的龙图腾崇拜物产生得更早。《虎图腾崇拜与虎神话》在中原古文献基础上,利用彝、纳西、土家、白、普米等少数民族资料,说明西南诸民族

的黑虎崇拜和白虎崇拜都来源于西北古羌民族。《东北崇虎与中原文化的渊源》中,作者利用《山海经》《史记》《汉书》等古籍记载,对虎文化东播进行了论证,从《鸡林旧闻录》《盛京通志》《海城县志》《义县志》《长白汇征录》等地方志,以及弗·克·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莽林中》中,寻找东北各族祠虎为山神的证据,同时还结合田野调查,对东北各族的虎图腾崇拜、石虎镇墓古俗、东北虎地名及传说等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该书文献资料详实可靠,田野调查丰富生动。

同时,《中国虎文化研究》从多角度切入,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学术框架。汪玢玲在后记中说:“因为写作题材涉及珍稀动物虎的实体,又放置在几千年文化史的位置,多角度地论述虎文化的各个方面,故本书力求将自然科学(生物学)知识,社会民族学、民俗学资料构架,文化史学体系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贯彻于全书始末,以完成全书的撰写目的。在研究方法上自然是采用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文艺学、语言学诸多方面的考古、文献资料和有限的田野作业调查(直接或间接的)相结合的方法,做综合研究。”^[29]^(P367)著作遵循了这一研究思路,结构布局上灵活运用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每章都有不同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侧重。此外,《中国虎文化研究》的贡献还在于填补了东北及西伯利亚虎文化这一重要中间地带的研究空白。当然,这部具有中国虎文化研究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并非尽善尽美,其内在的编排结构有逻辑不当之处,全书架构虽具系统性,但相较于虎文化研究理论的探讨而言,部分内容更侧重于从民俗学视野进行描述,试图将虎文化纳入民俗文化领域,对虎文化学的价值有所忽略,书中的某些论点亦有可商榷之处。整体来看,汪玢玲“建成了一座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中国虎文化学宫殿”^[30],确立了其虎文化研究领域开拓者和领军者的地位。

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探索也是近四十年虎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

刘尧汉是关注虎文化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学者,他将文化史线索与民族考古材料结合,强调历史逻辑与民族志考古新材料的互证方法,积极参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命题,提出了彝族虎文化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动力。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堪称虎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代表成果,它不仅立足于中国文明探源而开展虎文化研究,而且别开生面地突出了虎文化在中国文化起源上的独特意义,对于重新发掘和认识虎文

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上的特殊地位具有重要价值。这一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中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文化研究史上的闪亮明星。

虎故事的收集整理有宋以来即有较多成果。明嘉靖年间谈恺等的校刊本《太平广记》收录虎故事8卷(426~433),共80多则故事;明代王穉登辑《虎苑》为虎之专集,上下两卷共收14篇,上卷设德政、孝感、贞符、占侯、戴义、殄暴、威猛、灵怪8篇,下卷设豢扰、搏射、神摄、人化、旁喻、杂志等6篇,总计有145则与虎有关的资料。后来王穉登探望病中的陈继儒,送了一本《虎苑》,说虎可以“辟疟”。陈继儒受《虎苑》启发,搜集了更多与虎有关的故事,并集结而成《虎荟》。此书是继《虎苑》之后另一部与虎有关的专集,共有6卷,6万余字,书中采录秦汉至明代的史传、志怪、传奇、野史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包含了虎为民族的图腾信仰、人化身为虎、虎化身为人的宗教与虎等有关条目约363项故事。

事实上,国际学界早就关注了故事的叙事形态研究。苏联学者弗拉迪米尔·普洛普在20世纪20年代对本国民间故事进行细致描述研究,进而创立了民间故事形态分析理论。这意味着除了对故事做分类研究外,还需要进一步对故事的叙事结构做出描述,这样的研究旨在发掘故事的深层意义。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其1969年出版的《〈十日谈〉的语法》中,首次提出叙事学概念,另外,克洛德·布雷蒙的论文《叙事可能之逻辑》及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语义学》一书,都可视为当代叙事学的奠基之作。上世纪80年代叙事学进入中国,90年代出现叙事学热,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就民间文学领域而言,很多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叙事学理论对民间故事做叙事结构的研究。孙正国借鉴和学习这些西方成果,对中国虎故事做了叙事学研究,主要运用A·J·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和布雷蒙的叙述序列学说,对叙述者、叙述程序、角色模式及深层结构做了解读。他以叙事学方法分析《师道宣》的叙述者兼具史臣与说书人的双重个性;运用格雷马斯角色模式理论,将其角色模式呈现出角色与人物的复杂关系:一个角色同时由几个人物承担,一个人物也同时充任多个角色。这种多元一体的角色矛盾格局预示了叙事文本深层结构的矛盾与悲剧;从叙事程序来看,整个叙事过程由五个程序组成,作者对每个程序及其结构关系做了详细具体考察,揭示出故事蕴含着深刻的双重悖论,即“异化母题”和“惩罚母题”建构的双重悖论,揭示出

《师道宣》的本质意义是人类无法超越自身局限性的悲剧。叙事学方法为虎故事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弥补了传统研究中忽视民间故事首要是作为叙事文本的不足,加强了虎文化研究的理论深度,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作为文化文本的虎类型故事的价值,发掘中国虎文化的深刻内涵。对虎故事的叙事研究,既考察它的文化人类学价值,也把握它的文本的叙事性特征,对当代民间故事研究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中国虎文化研究路径的新思考

近四十年来的中国虎文化研究,从单一学科的研究,逐渐发展到多学科交叉融合;从简单搜罗资料上升到文化内涵的探讨,从文化起源的考订,延伸到不同民族、不同事象的综合研究,都取得了对象认知和方法论两方面的显著成果。然而,由于虎文化所涉及的历史材料过于庞杂,民族差异特别多样,文化形态极其丰富,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在研究路径方面有待学界更多的探索。笔者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一是虎文化的历史地位与虎文化研究实绩之间存在较大距离。

龙文化的起源、发展、特征、内涵等的研究,已成为学界极其重要的研究命题,相应的虎文化研究则相对疲弱。同时,从龙虎崇拜到龙崇拜,除了民族心理变化、统治者人为推动之外,是否还有更客观的原因?例如,虎患猖獗,人们由崇虎渐变为崇虎和伏虎并存,虎呈现出善恶两面性,导致其在主流文化中逐渐走下神坛。“对虎的神秘信仰虽然依然存活于种种民俗事象之中,故事中老虎形象的凶暴与神圣色彩却日益淡化,变得更为亲切而深通人性。”^{[17](P454)}而龙则是相对虚幻的信仰对象,是不是诞生的神秘性导致其最终占据了中华民族主要信仰的地位?潜明兹在《中国神话学》一书中指出:“至西周初,龙、凤与虎的纹样逐渐增多……经汉、唐至宋,由于龙凤的贵族化,虎的神秘色彩渐薄弱,广泛深入到民间而世俗化,才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母题之一。”^{[31](P307)}

二是文学研究和文化学研究是否可以结合得更密切。

在中国这个民俗资料极为丰富的国度,运用人类学、文化学来观照虎神话、虎故事,能从文学作品中发现更多可研究的对象。例如,人们早期的崇虎文化实际上属于动物崇拜,而动物崇拜的根源之一是人弱勢于某个动物时对它的推崇;当人征服自然

的能力逐渐提高,随之发生变化的则是对崇拜对象的心理地位的改变,崇虎渐变为崇虎、伏虎并存。民间信仰心理的改变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某些仪式中,也会呈现在虎文学,主要是虎故事、虎小说中。唐代小说中精怪化的虎形象数量增多,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情况,人们能投射情感从而获得实用性、功利性价值的不可控的神鬼等虚拟物,地位保持上升趋势,属于人力可控的崇拜对象,地位开始逐渐下降。化身型虎故事中,人化虎和虎化人故事的产生原因值得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去考量,也可以从解释学角度看待人化虎和虎化人故事的创作心理异同。中国民间虎信仰和虎故事的关系,不同时代民间对自然虎心理的变化对虎故事演变的影响,不同民族流传的虎神话、虎故事与该民族时代境遇变化的关系等问题都可做进一步研究。

三是虎的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应该分开解读,还是可将二者合而为一进行解读。

在中国古代,虎是较为常见的动物,人与虎之间的关系密切而复杂,在这种现实情境中,虎的自然特征逐渐被吸纳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并通过图腾、文字、绘画等,定义为具有文化属性的意象和符号。诸如“威武勇猛”“祸害人畜”“虎皮华美”“虎性不智”等,虽为虎的自然属性,但在许多古文献、虎神话故事中,也频频用来指涉人类社会的某类人或事件的特征及性质;而“引魂通天”“纳福辟邪”等,则是人们赋予虎的神秘力量,这些当属虎的文化属性,在虎民俗、虎故事中出现,寄寓着人们的美好愿望、个人情感和文化精神等。笔者认为,虎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不可机械地分开解读,因为其自然特征已经在长期的民族文化浸润中被赋予了人的情感和思想,当我们谈到虎文化、虎图腾、虎民俗、虎故事时,无论是生物属性还是文化属性,都已被打上了属于人类意志的烙印。只有进行综合观察,我们对虎文化的研究才可能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尽管当下中国虎文化研究的范围更广,考察视角更多元,但对其研究的深度还可做更多思考。虎图腾神话与民族宗教的关系、虎俗与历史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虎故事的叙事学批评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景下虎文化传统的传承创新等,都成为我们当下虎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虎文化材料还会增加多少,无论虎文化的理论阐释有多难,学界持续关注虎文化研究的发展情况,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方法,适当地推进地方政府、公司和学者三方参与的坦诚对话,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

虎文化研究的基本需要。

参考文献:

- [1]叶舒宪.中国虎文化图说[J].寻根,2010(3).
- [2]汪玢玲.中国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杨阳,林芳,周佳.中国“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 [4]曹振峰.神虎镇邪[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 [5]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 [6]王朝晖.从虎图腾到祭虎与忌虎——土家族“虎文化”现象简论[J].民族论坛,1994(2).
- [7]林琳.论虎图腾崇拜源流及其对古代政治军事的影响[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 [8]王秀薇,孟凡清.北方草原艺术中“虎图腾”形象[J].学术交流,2013(9).
- [9]朱德普.傣族的虎图腾[J].民族研究,1995(6).
- [10]杨甫旺.古代巴蜀的虎崇拜[J].四川文物,1994(1).
- [11]刘尧汉.道家 and 道教与彝族虎宇宙观(上)[J].贵州民族研究,1984(1).
- [12]易谋远.道家 and 道教之“太一”源于彝族虎宇宙观吗?——和刘尧汉先生商讨[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5).
- [13]陈永香,曹晓宏.昆仑神话与西南彝语支民族的虎崇拜[J].青海社会科学,2010(5).
- [14]赵宗福.中国月亮神话演化新解——以月虎为主题的考证[J].民间文学论坛,1995(4).
- [15]孙正国.中国虎故事的类型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 [16]孙正国.人虎缘故事的文化解读[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6).
- [17]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18]曹小丰.先秦至隋唐时期小说中化身型虎故事的发展演变[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 [19]孙国江.虎依故事的历史根源[J].北京社会科学,2013(5).
- [20]王立,铁晓娜.《聊斋志异·向杲》化虎复仇故事的中印文学渊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 [21]高明.晚明江南的尚奇之风与虎故事的编纂[J].民俗研究,2008(1).
- [22]黄大宏,张天莉.明陈继儒《虎荟》研究[J].文献,1999(3).
- [23]肖远平.苗族“人虎婚”故事的民俗文化分析——以《稚榜嫁虎》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9(3).
- [24]肖远平.生命美学的直觉体验——彝族苗族虎故事审美心理比较探寻[J].贵州民族研究,2008(5).
- [25]刘正平.唐五代文言小说虎故事的巫术文化解读[J].宗教学研究,2006(3).
- [26]马知遥.中国虎文化探源及民间布老虎生存状况反思[J].艺苑,2012(1).
- [27]苑利.韩民族与中国西南彝语支民族虎图腾文化比较[J].民族艺术,1998(2).
- [28](韩)安东濬.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韩国虎图腾崇拜比较研究[J].任晓礼,译.宗教学研究,2010(4).
- [29]汪玢玲.中国虎文化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30]谭达先.务实求新的权威性专著——评汪玢玲著《中国虎文化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3(3).
- [31]潜明兹.中国神话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 qiangchen42@163.com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Tiger Culture in Recent 40 Years

Ren Kuan

(School of Culture and Media, Guizhou Normal College, Guiyang 550018, Guizhou)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tiger culture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academic exchanges and theoretical methods for referen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tiger culture research mainly include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iger culture, tiger totem worship and tiger mythology, tiger culture in religion, tiger customs, tiger stories and other studies of tiger culture. Thes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tiger culture history, tiger beliefs and folk art, etc., have been widely documented and discussed deeply. From this, it is of great value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to think about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innovation path of current Chinese tiger culture research and provide new materials and viewpoints for the overall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tiger culture; research system; review; reflection